

变化世界中的中国经济

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经济学系列讲座论文集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经济学系列讲座论文集

变化世界中的中国经济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化世界中的中国经济: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经济学系列讲座论文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编.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

ISBN 7-301-04390-2

I. 变… II. 北… III. 经济-研究-中国-文集 IV. F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0280 号

书 名: 变化世界中的中国经济: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经济学系列讲座论文集

著作责任者: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编

责任编辑: 林君秀

标准书号: ISBN 7-301-04390-2/F·326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7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兴盛达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 者: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6 印张 300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6 月第二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实价: 26.04 元

序

1840年的鸦片战争宣告中国几千年来享有的天朝大国地位正式终结,文明古国的大门终于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此后的整整一个世纪,中国沦落为一个贫穷落后、受人欺凌和宰割的弱国。到19世纪末,列强环伺之下的中国已经濒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近代中国历史既是一部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血泪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进行救亡图存的奋斗史。北京大学正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紧要时刻于1898年作为戊戌维新重要组成部分而诞生的。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她就被赋予了沉重的历史使命。北大始终与民族和时代同行,历经沧桑,从1898年成立时的全国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管理机构演化为今天的全国著名大学,终于在1998年迎来了一百周年华诞。一个世纪以来,北大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以“五四”精神为代表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薪火相传,始终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积极推动力量,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作为中国社会新思潮的主要摇篮和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北大对国家和民族的有形、无形的贡献无可估量。北大一百年来走过的历程是中国历史的缩影,今天,北大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北大的师生,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不可推卸的责任隆重纪念北京大学百周年华诞!

展望下个世纪,只要几代人再同心协力,中华民族将有机会重领世界文明之风潮。民族的复兴,必须有坚强的经济基础,但同时也要有文化、思想的辉煌进步。作为天之骄子的北大学子应该有大抱负、大眼光,利用在校期间,打好基础,做好准备,为下个世纪中国经济和中国文化的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为此,假北京大学百周年华诞之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起并主办了“北京大学百周年校庆经济学系列讲座”,邀请海内外实业界、经济学界、政府经济管理部门成绩卓著的领袖人物到北京大学举办讲座,将他们的事业心得、研究成果、工作经验贡献给北京大学师生。

北京大学百周年校庆经济学系列讲座总共举办了25期,应邀作讲座的有事业有成的海内外著名华人大公司领导、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也有长期担任高级经济决策者的杰出政府官员。其档次之高、规模之大,为北大历史上所罕见。这些各界领袖人物凭着对中国和北大的崇敬和热爱,或者将

毕生创业、做人的真知灼见,或者将潜心研究的成果,无私地奉献给北大百周年华诞。他们精彩的演讲在校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不但深受北大师生的欢迎,而且还被许多报刊采用。如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的演讲《中国改革的第二代战略》很快被《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和其他报纸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载,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作为纪念北大百周年华诞活动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将他们的演讲辑录成书,奉献给北大和广大读者。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这次北京大学百周年校庆经济学系列讲座能够取得圆满成功,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全体师生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研究同学会的张焕腾、颜冰和其他同学,以及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办公室的张佳利、邢惠清、行桂英、赵普生、马晓萍老师为讲座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没有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这次系列讲座就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功。

这次系列讲座大部分是用英文进行的,无论当初是用英文还是中文演讲的,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各部分都是根据各位演讲者的演讲录音和讲稿整理而成的。各部分的顺序以各演讲者实际演讲的日期先后排列。除了正文中已经注明姓名的翻译、整理者外,作者简介和其他各部分均由江慧琴翻译、整理。江慧琴还对书稿做了整理、校对工作。最后全书由胡书东统校、定稿。

北京大学百周年经济学系列讲座的各位演讲者都有自己重要而繁忙的事业,对他们在百忙中拨冗演讲,我们代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再次表示衷心感谢!

衷心祝愿北京大学在第二个百周年里更加辉煌!

林毅夫 赵耀辉 谨识

1999年7月于北大朗润园

目 录

中国会成为下一个超级经济大国吗?	威廉·欧佛豪尔特 (1)
一位年轻香港女士在内地从商的经验	杨敏德 (8)
全球一体化中的中国	陈启宗 (14)
亚洲金融危机及其教训	细川恒 (27)
信息革命、交易成本、文明和经济运行	狄帕克·库玛尔·拉尔 (37)
在增长中挤压泡沫、改善结构,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 “第二次软着陆”	秦晓 (48)
“海鸥精神”——创立瑞安的原动力	罗康瑞 (56)
香港经济的何去何从	钱果丰 (64)
我的创业历程及对香港和内地经济发展的看法	蒋 震 (72)
资产经营、中国企业与国际市场	陈伟恕 (78)
从华远集团的发展看中国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	任志强 (91)
市场经济下的人才与发展	王英伟 (101)
21 世纪的世界农业	普拉博·L.平嘴利 (109)
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面临的挑战	维尔弗里德·R.范豪奈克 (118)
国有企业三年能走出困境吗?	黄鸿年 (127)
新千年里的大中华	郑明训 (140)
亚洲经济问题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	马丁·费尔德斯坦 (145)
农业与经济发展	D.盖尔·约翰逊 (156)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金融体系发展的新动向	鲁迪·多恩布什 (168)
欧元产生的背景及对未来世界的影响	弗朗西斯科·基阿瓦茨 (175)
中国改革的第二代战略	约瑟夫·斯蒂格里茨 (179)

中国与亚洲金融危机	德怀特·珀金斯 (200)
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源泉	刘遵义 (218)
东亚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郜若素 (236)
美国金融结构改革	恩斯特·T. 帕特里克斯 (245)

中国会成为下一个超级经济大国吗？

威廉·欧佛豪尔特(William H. Overholt)

〔作者简介〕 威廉·欧佛豪尔特(William H. Overholt),美国信孚银行地区总部(香港)执行董事,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职务有:Hudson 研究所 Hudson 研究服务部主任,商业和专业同盟执行委员,美军战略研究所、对外服务协会和许多大公司的外国事务和战略策划顾问。著作有:《中国的崛起》(1993 年,被译为 9 种文字)、《政治风险》(1982 年)、《战略策划和预测》(1983 年)、《亚洲原子能前景》(1976 年)、《巴西未来》(1978 年)。

今天我很高兴能来到这所世界著名的大学。这里的教授们早在本世纪初就为建立一个理想的教育体系而奋斗,这在当时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今天我为自己能和他们坐在一起而感到荣幸。在这里讨论中国问题,我没有十分的把握,我只能尽力从某种国际的角度来提出一些问题、意见及建议。当然,这些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当我们在大学里演讲时,我们一直在尽力按照自己的理解将某条真理明白地表述出来,但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地掌握真理。

我首先要阐明的是,有几个亚洲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而中国正是亚洲经济奇迹的一员。要了解这些国家为什么如此成功,我们必须忽略意识形态的差异,因为它们不能反映诸如新加坡、中国、韩国等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所取得的共同经验。几年前当我开始写《中国的崛起》这本书时,我做了一个演讲。当时我放映了中国 10% 的经济增长速度和 38% 的储蓄率的图表。紧接着演讲的是台湾驻香港的代表,他对我说:“比尔,你辨识那些数据了吗?那是你们国家 15 年前的数据。”

我想说的是,在这些相同的数据后面,还存在着相同的发展战略的前后顺序和相同的问题。试比较一下亚洲和东欧的发展道路。在中国、韩国、新加坡,经济增长最先发生于农业而不是工业,是轻工业而不是重工业。他们先进行价格改革,然后才是私有化改革;先强调经济,然后才是政治;先强调国内事务,然后才是对外事务。但前苏联发展战略的前后顺序则恰恰相反。他们强调对外优于对内,政治优于经济,重工业优于轻工业,农业放在最后。所以亚洲国家所具有的相同的发展战略的前后顺序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背后也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因素。

30年前的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但那主要是由于地缘政治。美国认为它的盟友都是资本主义的,都是民主的。事实上,30或40年前,那些盟友并非如此。在新加坡,李光耀领导了一个与共产党结盟的党派。当他赢得大选后,他要求党员都要互称同志。在台湾,国民党的结构也类似于布尔什维克:它由一个人来领导,就是蒋介石;它有中央委员会;政府拥有银行;政党拥有庞大的公司企业。所以台湾并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式的民主地区。但它是美国的盟友,因此肯定是资本主义的,而且肯定是民主的。在韩国,创造了经济奇迹的朴正熙,早期曾因为支持其兄弟的共产党组织而陷入巨大的麻烦之中。同时他的顾问们发现很难让他同意韩国大公司私有化。所有这些对于理解亚洲不可思议的经济成功是十分重要的。这些国家的起点和中国差不多,也面临着中国所面临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激烈的社会变动而非意识形态,是国内压力而非国际压力的产物。当我在美国谈这些事情时,记者和议员们非常不安,我不应该将他们的资本主义民主风格同社会主义国家混为一谈。可当我在社会主义国家谈这些事情时,人们因为恰恰相反的原因也变得不安起来。

让我们从冷战时期回到现在,看看亚洲经济奇迹的一些特征。第一个是有史以来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各种数据在亚洲各国非常相似。在开始现代经济发展的最初20年中,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经济都以10%的速度增长。它们都有相当高的储蓄率。而俄国和东欧等其他国家的经济改革则以失败告终。波兰是东欧各国中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可是至少还需要15年才能使其收入恢复到改革之初的水平。经济的成功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数据上。现在让我们看看一些国家的人均寿命:中国为69岁;印度为61岁;俄国男性为51岁;中国男性为71岁……这种根本性的差异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而它对于工业和农业的增长更为重要。亚洲的改革改善了其社会各方面的状况,每个社会阶层都从中获益。这种现象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中是非常少见的,因为一般来说,经济发展会造成大批的受损者和受

益者，而在亚洲经济中几乎没有受损者，国家也从中获益。高速的经济增长使人们感到他们在分享同一块蛋糕，在这种利益驱使下，国民被团结到一起。而当经济出现滑坡时（就像前苏联那样），每个人都会抢夺属于自己的那块蛋糕，并在蛋糕变得越来越小之前脱身。

亚洲经济奇迹的第二个特征是国家权力与威望的迅速提高。一个世纪以前，中国和朝鲜的弱小使它们对世界充满了恐惧，并将自己隔离在世界之外。人民在挨饿，当时的统治者对外也卑躬屈膝，受尽屈辱。如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带着自豪走向世界，因为他们领导的国家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经济的增长也造成对世界市场的影响力的更大增长。根据收入曲线的特征，如果收入增加了一点点，整个曲线会被往外推，30%的收入增长能造成500%的市场增长。所以这些国家对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如今中国已成为新电话线路的主要建造者，飞机的主要购买者，可口可乐的主要市场。所以经济的增长使这些国家成为世界贸易竞争的焦点。

第三个特征表现在政治领域，各国领导人在国家和经济基本发展方向的问题上态度十分一致。20年前，韩国面临着政权的交替。1979年，朴正熙被害，每个人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过去所有的变革都是由他一个人发起的；两个世纪的混乱会不会重新出现？答案是没有。因为韩国或中国在过去的200年中一直努力探寻国家繁荣富强之路，最终找到了使经济增长最快的方法。屈辱的历史与这20年来巨大的成功不同在于领导人之间是否有一致的看法，以保证政策的延续。在朴正熙去世后，韩国仍坚持他的经济与外交政策，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比较少见的。十年前在菲律宾，如果阿基诺掌权，那是一种政策；如果共产党掌权，那又将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政策。而在韩国、新加坡和中国，情况就不是这样。不管哪个政府当权，政策的差异都很小，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中国，邓小平上台以后，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在过去的四年中，中国统一了其货币体系，即使是四年前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的时候，人民币地位也是被加强了。这通常不会发生。一般说来，当通货膨胀比较严重时，货币应该贬值。但中国有贸易盈余，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投资，光去年就有45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对比，巴西是第三世界中的第二大国，在二战后的头50年中，它吸收了34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而中国在一年内就比它多出15%。这要归功于经济对外开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中国将通货膨胀率从22%降到几乎为零。外汇储备在四年中从210亿美元增长到1400亿美元。

现在让我们看看仍存在的问题。大部分的亚洲国家在过去的几年中都

遇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泡沫经济。他们的政府投放了大量的低利率贷款,而这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是不大可能出现的。拿日本来说,皇宫的地产价值相当于整个加利福尼亚州的地产价值,而东京的地产价值则超过了美利坚合众国全国。这就是泡沫,它的出现是由于大量的低利率日元被投入房地产。泰国和马来西亚也有地产泡沫,不同的是投资是以美元而不是本国货币的形式来进行的。印度尼西亚有庞大的工业公司,大部分同印尼的总统家族有关。韩国也有像大宇和现代那样的庞大的集团公司。它们不断地扩大是因为取得了在纯市场条件下不可能获得的低利率贷款。这些泡沫经济最终是要崩溃的,而一旦破灭,房地产和股票的价格会发生大幅度的滑坡,失业问题会变得更加严峻,银行放出的贷款无法收回,从而不得不进行资产清算。

目前许多亚洲国家都陷入了困境。一些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如香港已经开始果断而且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我想香港会在年底前重新繁荣起来。而另一些国家则试图掩盖这些问题,比如日本。它的泡沫经济的崩溃发生在1990年,从那时起,日本的经济就处于停滞状态,因为它的政府一直试图保持房地产价格,活跃股票市场,防止大公司破产,防止银行倒闭。在美国和香港,如果一家银行面临倒闭,政府最先考虑的是储蓄者的利益,而不是银行拥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这种出发点能使市场迅速调整。美国在80年代也遭遇到了泡沫经济,但很快就调整过来,结果成为90年代最强大的经济大国。而日本的泡沫经济就没有得到及时处理,以至于其经济在七年之后也没有恢复过来。

下面我们来看看中国。中国也有泡沫经济,就是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产生的原因也是因为过量的资金流入到工业中,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当然,这种投资的刺激能在一段时间内起作用,但在长期中它必然会引起泡沫经济。前苏联想掩盖他们的泡沫,结果是这个泡沫不断膨胀,最后当它崩溃的时候,整个国家也随之崩溃。中国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有两个不利条件。其一是泡沫正在膨胀,其二是中国的银行体系,它比起亚洲其他各国的银行体系来,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它的坏账比率相当高。

但中国也拥有一些有利条件。其一,投资以人民币而不是美元的形式进行,这样,外国投机者便不能插足。在亚洲其他一些国家,泡沫经济的崩溃是由于投机者攻击其货币体系,于是利率上升,靠低利率贷款来维持的工业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而投机者由于不能进入中国的金融体系,无法攻击人民币。其二,中国的领导人在泡沫经济崩溃前就在认真处理这个问题。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领导人否认经济存在问题,所以他们的泡

沫不断膨胀直到市场无法承受，于是经济的恢复与调整变得相当困难。而中国的领导人对经济问题不加掩饰，他们承认这些年来国有企业和银行一直存在问题，迫切需要改革，这种态度降低了处理问题时所花费的社会成本。但亚洲各国的经历表明，处理泡沫经济的成本是相当高的，这意味着接下来的两年对中国来说将是相当痛苦的，这是中国成为经济强国所要经历的第一个挑战。接下来的四年不同于已过去的 20 年。政府公务员和国企职工不愿丢掉工作，他们对社会变革的抵触将成为比较严重的政治问题。但果断地处理泡沫经济要比等着它崩溃好得多。

第二个挑战是社会变革的挑战。当经济快速增长时，社会变革也更容易出现。如果人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他们当然是被动的。而当人们有了足够的食物、住房，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他们就变得比较自信。同时，经济的增长带来了更多的教育机会，而受过教育的人往往爱问更多的问题，对他人及社会的要求也提高了。这个变化来自对科技的高度重视。在农业社会，科技的进步程度不会带来太大的变化。而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科技发展程度的高低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于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他们要提出更多的问题，而政府必须允许他们这么做，否则会打击他们在技术改革方面的积极性。由此产生的一个趋势是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地位的降低，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20 年前的中国，所有的人都是为政府工作。而如今这种性质的工作只有 18%。这种差异造成了社会和政治的基本变革。在现代经济中，人们的生活与工作不再固定于某一点，这意味着建立在固定区域模式上的机构不能像原先那样运作良好。

另一个变化来自于对法制管理的要求。如果我拥有一家大的中国企业，要进行投资，比如说，投一亿人民币，那么我需要知道在投资过程中应该遵守什么规则，而不是依赖于某个部门的负责人。三年前，我和香港商界的代表来北京了解终审法院的运作程序，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在“九七回归”前了解终审法院的运作是十分重要的。当时我和李鹏总理谈了很长时间，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规则，是不会进行投资的。这次会谈使我们提前两年了解到了法院的运作规则。另外还有两个趋势——透明度和可信度——从根本上影响着一个社会的运转。当我们要向一家公司提供贷款时，我们需要知道这家公司以前的盈利状况、主要产品、成本消耗、经营策略、领导人员等等。如果我们能了解到所有这些情况，那么这家公司是有一定的透明度的。所有的西方公司从亚洲泡沫经济的崩溃中得出的一个共同教训就是要求越来越高的透明度。我们曾经向泰国的公司提供贷款，当时他们没有透露其

负债状况,现在他们破产了,我们损失了一大笔钱。经济越发达,投资者对透明度的要求就越来越高。但企业不欢迎透明度,政治家也不喜欢它。韩国的前政府曾经进行一场增加透明度的改革,要求人们在账户上使用真实姓名,其结果是该总统在五年的任期内除了应付各种各样的丑闻以外没有做任何事情,而人们对改革的结果也大为吃惊:总统卢泰愚从企业界得到了6亿美元的竞选资助,因为他向他们承诺了各种优待。透明度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强大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它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一旦政党从企业中脱离出来,政府也就同企业分离了。政府的企业经营者职能同企业所有者职能分离,这样就形成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接下来需要的是一套有效的规章制度来防止政府领导和企业领导的相互干预,并规范他们的行为。当然,由于情况的不断变化,在这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是比较困难的。当我在美国作报告时,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来使美国人明白,美国式的民主是不可能在半文盲的农业社会实现的,同时,60年代的事实证明,它也不能在韩国实现,因为人们受到了足够的教育,充分意识到那是自己的事务,准备走自己的路。当我在亚洲地区演讲时,我强调的是社会和政治结构必须跟上时代变化的步伐,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则来告诉你如何去找平衡点。比较一下1980年的韩国,1976年和1992年的泰国,1947年的台湾,你会发现他们都遇到了严重的不可避免的危机。这是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一个风险。所以中国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如何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找到增长的平衡点,它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但所有国家得出的一个共同经验是,经济发展造成的压力非常大,并且平衡点不断变动。可以说中国的五年计划十分客观地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速度。现在在中国的领导层里,不同的意见可以自由地发表交换,人民有权监督政府,在许多事情上有了更多的公开讨论。这同我20年前所见到的中国是完全不同的。我曾经告诉我的同事,在中国,如果你仅拍下一张照片,所看到的有可能是贫穷、对言论的限制,以及其他种种落后现象。但如果你拍摄下一组移动的画面,你会发现中国经济的增长比已经属于高增长之列的其他亚洲各国还要快。

最后一个挑战是中国所采取的国际姿态。在这之前,我先来谈谈其他亚洲经济奇迹的经历。当朴正熙在1961年取得韩国政权时,北部的朝鲜十分强大而韩国相对弱小。在50年代,韩国几乎将所有的财政收入用于军事支出,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增长,与朝鲜的差距越来越大。朴正熙上台后立刻决定将军事预算支出减到国民经济的4%。他说:“我们要在经济增长上作文章,超过朝鲜。”现在韩国的经济规模是朝鲜的35倍,所以韩国是通过减少

军事支出而成为亚洲经济强国的一员的。邓小平在中国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在“文化大革命”中期，中国将国民经济的 16.5% 用于军事支出。当 1979 年邓小平开始改革时，军事支出减到 10.5%，而他继续削减，最终军事支出只占国民经济的 3.25%，与朴正熙所选择的数据十分相似。随之而来的是对外政策的变革。过去中国盲目地支持在其他国家爆发的革命，如今它不再那样做了；它曾经与韩国对立，现在两国关系非常友好；它曾经与前苏联冲突，对日本和美国采取敌对态度，现在所有这一切都被和平取代。在这里我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领导人成功地完成了香港的平稳过渡，每一个香港人都会为此感激，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中国向世界做出了和平的承诺，正因为如此，每当我的朋友对中国的日益强大表示担忧时，我会告诉他，在 20 世纪我们有过弱小中国的经历，这对中国、对世界来说都是非常糟糕的。如果中国在当时很强大，也许就不会有两次世界大战了。尽管没有人能够指出在今后的 25 年中谁会领导中国，以及他们的意图，但我可以肯定，弱小的中国对整个世界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我欢迎一个强大自信的中国，以使它不再重蹈本世纪初的覆辙。

未来世界的和平主要依赖于中美两国的和平，我们应该严肃地承担起这个责任。美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同时，它是建立在某种信仰上的国家。德国之所以是一个国家是因为每个人都是德国人，中国之所以是一个国家是因为每个人都是中国人，而美国则融汇了各国人，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的力量是对自由、民主、人权的信仰，而美国也试图将这些信仰灌输到其他国家。问题在于，美国人对其他国家的了解并不多，所以当我们试图让别人做得和我们一模一样时，我们显得鲁莽和无知。在美国，每个人都有权表达他们自己的看法。于是记者和议员们充分行使这项权力，使得美国的政策有些激进，甚至会侵犯别的国家。我认为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是非常不明智的举措，我正和国会的议员们讨论这件事。中美两国总是在一些诸如贸易、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发生争吵，但我们有共同的利益，我们都期待和平与繁荣。如果中国人的收入增加了，会买更多的可口可乐，这对美国人是有好处的。如果中国变得强大，美国人会同你们一起来庆祝中国的成功。

一位年轻香港女士在内地从商的经验

杨敏德(Marjorie Yang)

〔作者简介〕 杨敏德女士，香港溢达集团董事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学士，哈佛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现任职务有：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名誉会长，青年总裁协会中国分会主席，新加坡胜宝旺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业务顾问，美国宾州 Baldwin 学校委任校董会顾问，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女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常务理事及理事，中国苏州杨元龙教育基金会主席，“潮流一派”电视节目之嘉宾主持，香港志链净苑佛寺重建委员会委员，新华社广东分社事业发展高级顾问，中国新疆自治区工商联副会长，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校董，香港公开大学校董会委员。

一、年 轻

我要演讲的题目是《一位年轻香港女士在内地的从商经验》。所以，说到“年轻”，这是像林教授^① 这种年龄的人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我其实并不年轻，但是我不愿和他争论这个问题。最近，我回到哈佛，意识到保持年轻是极为重要的。保持年轻最好的办法是每天都学习。这将使思想和精神保持活跃，使你感到年轻。哈佛提倡终生的学习和创新。他们也认为今天的年轻人是这个世界的领导。我们应该把这个领导等价地理解为学习。我想你们一定听过哈佛校长陆登庭在北大的演讲，知道这一点。有些事情是年轻人所擅长的。因此，为了领导世界，我们必须努力保持年轻。

① 指林毅夫——编者注。

我的文化背景和所受的教育用单词“PYE”来代表最为合适。那实际上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而我希望是这二者的融合。我从东西文化的源泉中同时得到启发。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这两种文化并尽量作一些补充。每当我看到我们抛弃自己的文化,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的情形时,我都很悲哀。

我有一位朋友 Po Chang,他是敦豪国际快运的创立者。敦豪现在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经营,是世界最大的商业网络。我的朋友认为东西方在管理的理念上正在趋同。亚洲人通常说“优秀的品质是成功的基础”。西方人认为“有枪就可以旅行”。将来,我们会趋同。我们会说“有好的体格并且会射击就可以旅行。掌握自己又具有 MBA 知识的人可以实现任何层次的合作。”现在,我认为我们必须学习。我们不能抛弃自己的文化而追随这个时代所流行的东西。我认为你们必须接受中国的文化,同时从流行的管理理论中吸取其精华,然后把二者结合起来。这样才会找到适合我们的东西。

二、香 港

香港是我的家乡。香港的优势是它可以充当西方和中国内地之间的桥梁。

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称香港为市场经济的完美典范。从香港我们可以获得知识和经验,进而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催化剂。我们的优势是低税、市场经济和自由放任的政府,我们有对于中国内地和西方的理解,我们试图使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

我的公司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把西方的管理和市场经济的知识与我们优质的原材料(新疆的棉花)结合,我们有在全球市场竞争中获胜的一个纺织工业基地和一个优秀的劳动力市场。这几方面缺一不可。

三、妇 女

我是一个女儿、离婚的女人、一个母亲和商界女人。我的父母一直认为,女孩应该与男孩受相同的教育。父母鼓励我进入最好的学校,在事业上有所追求。当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就读时,男女比例是 8:1,现在是 1:1。在哈佛商学院,当时男女比例是 8:1,而现在是 3:1。我非常幸运,可能是女权运动的受益者。我有美国最好的大学所需要的数理背景。

我很高兴地离婚了。我认为,一个人无论他结婚还是单身都可能幸福。通常,年轻的女人认为只有结婚才会幸福。我认为只要在生活中有一个目

标,就会幸福。女人有时候有这样一个观念,认为生活从遇到白马王子时才开始。而我希望在遇到“白马王子”前开始自己的生活。男人通常不这样想,他们认为女人只有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才开始生活,而对他们来说,生活在他们出生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并且努力追求它。我并不是说“赚尽可能多的钱”。那太狭隘了。生活有比那更丰富的内容。我有一个野心,希望建立世界上管理最好的纺织企业,一个我们引以为荣的中国公司,帮助教育年轻人。日本有索尼,美国有摩托罗拉,人们以在这些公司中工作为荣。我为能给世界所有的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而激动。

我并不认为钱是坏东西。钱是很重要的。但是,多少钱能使我像此刻一样幸福?陆登庭校长说,好的教育很值钱,值非常多的钱。生活中的很多东西很值钱。我可以非常大方地花钱。然而,我认为在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我从实现更高的目标上得到的满足比从买本季节最流行的手提包,或者从本年度最快的小汽车上得到的满足更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接受教育会使一个人的志向更加远大。当然,收藏和欣赏优美的艺术比在卡拉OK中吸烟更让人满足,这是我个人的体会。

四、在内地经商

1977年,我父亲开始在中国内地实施一个发展旅游业的项目。他在北京建立了三个宾馆——香山宾馆、西苑宾馆、明珠宾馆。同时,在无锡的光明服装厂开始做补偿贸易,这就是今天的溢达集团。

今天,溢达在全球有36000名员工,在中国有15000名员工。产值是7亿美元,转手贸易是4.5亿美元。我们种植棉花,制造针纺织品,出口服装。在国内销售用PYE的牌子。

“这是一个夕阳工业吗?”

观察的事实是:国有企业在失去他们的或者说你们的衬衣。国有企业纺织行业是亏损的。由于管理不善,他们把优质棉花变成了坏锭。所以这是一个夕阳产业?我们应该退出这个行业?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认为国有企业由于以下原因而亏损:

1. 落后的人员素质和落后的结构导致的落后管理。
2. 体制问题,例如工厂不接触市场。他们不得不通过“外贸”渠道销售。他们不知道目前的情况下市场需要什么。他们没有市场的概念。这就像让